

李大钊同志以图书馆为阵地 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

张玮瑛

李大钊同志于1918年1月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在此以前一个多月，震撼世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具有深厚爱国主义思想和高度革命热情的大钊同志，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继续深入探求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为阵地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列主义真理在我国传播的起点。

大钊同志担任图书馆主任之后，大量增购中外图书刊报，特别是宣传和介绍新思想的书籍，把北大图书馆办成传播新文化的阵地。1918年2月，北大创办“大学公余法文夜校”，他是发起人之一。

《新青年》出版之初，大钊同志还在日本，就已开始为《新青年》写稿；由日本回国后，成了《新青年》的积极撰稿者和编委之一。1918年7月，大钊同志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论述十月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同年11月，在天安门前北大举办的讲演大会上，他讲了《庶民的胜利》，又写了《Bolshevism的胜利》，在《新青年》五卷五号上发表。大钊同志在使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上，起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他热情地歌颂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揭露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实质，指出胜利的是“全世界的庶民”，“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他满怀信心地向中

国人民宣告说：“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指出一切腐朽的反动势力必将灭亡，布尔什维主义一定能在全世界胜利！

1918年8月，沙滩红楼建成，10月北大图书馆从原来在马神庙的旧址迁进红楼。在迁馆期间，为使师生能够不间断地借到书刊，大钊同志作出决定，发出布告：“每日上午闭馆，下午及晚间仍在旧舍开馆。”^①

新图书馆占红楼一层的大部分，经常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新书目录，有时还及时报导说：“下列杂志昨日到馆”，以便师生尽早阅览。当时远在英国伦敦的北大教授刘复写信回国，提出改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意见，信中提到：“我的朋友李守常先生，自从做了图书馆主任以来，没有一天不是很诚恳、很刻苦的想法改良……”（按：李大钊同志字守常）^②。

1918年10月，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同志经哲学系杨昌济教授的介绍，来北大图书馆工作。在红楼一层东南角的办公室内，和大钊同志朝夕相处。他的抱负、理想和才干深得大钊同志的重视，认为他是湖南学生青年杰出的领袖。大钊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有一定影响的。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和斯诺谈话时怀着深厚的感情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③。

1918年12月，大钊同志代表北大图书馆

参加“北京图书馆协会”，当选为中文书记^④。1919年1月，他参加北京大学教职员会，并被推选起草组织大纲，又参加筹备“学生游艺大会”^⑤同时，担任“学余俱乐部”的发起人。此外他还积极参加北京大学的许多活动，这使他和群众有了密切的联系，进一步开展了革命的工作。

大钊同志谨厚质朴的态度，使很多学生愿意和他接近。他谦虚和衷地帮助学生了解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内外的局势。他生活又很艰苦俭朴，待人诚恳，遇人有困难，常常以自节济人，遇有同志或工人中有求助于他时，大钊同志虽在困难之中，但总设法帮助。学生们常到图书馆向大钊同志请教，他总是热心指导，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书籍，给学生看，并且指点他们阅读的方法。当时有一批留日归国的同学，有的在北京教书，有的在北京继续深造，他们都爱到大钊同志那里去。许多青年把大钊同志看成是自己的导师，听他的教诲和指导，请他帮助。

1918年冬，大钊同志在北大组织了“马尔格斯学说研究会”，当时反动政府前来查禁。大钊同志等不是用马克思、而是用“马尔格斯”这个名字，为的是要迷惑警察的耳目。反动警察当局一听马尔格斯与马尔萨斯相混，认为这是研究人口论的，也就不来干涉了。这个学会，先是公开的，后来就秘密起来。它的对内活动是研究马克思学说，对外则是举办一些讲演会^⑥。

大钊同志的革命活动不仅在北京大学经常联系着一批爱国学生，还指导着校内外许多报刊、团体的活动。“国民杂志社”是1918年10月成立的，大钊同志对杂志社的成立和刊物的出版曾给予积极的帮助。在大钊同志的指导下，五四后的《国民》杂志开始刊载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新潮》是北京大学学生办的刊物，大钊同志担任了新潮社的顾问，同时又在图书馆拨了一间房子给新潮社使用。五四以前《新

潮》月刊在反对封建伦理文学上起了重要作用。他和鲁迅都为《新潮》撰过稿。

大钊同志还于1918年6月发起筹建少年中国学会，于1919年7月正式成立。总会设在北京，南京和成都设立了分会。学会成立后就存在分歧和斗争。以李大钊同志为首的北京总会会员大多数希望通过这个组织团结广大进步青年，积极从事政治斗争。会员中有不少人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国家主义者曾琦也是发起人之一，竟反对会员参加进步的政治活动，并对北京会员大肆攻击。北京总会在大钊同志影响下，极力争取少年中国学会确立社会主义方向，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团体。早在1920年8月，大钊同志就提出确定主义的问题，他认为“有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⑦。”1921年2月，该会在北京的会员在红楼图书馆大钊同志的办公室开会，再次讨论了确定主义的问题。6月，又召开一次谈话会，着重讨论了这个问题。由于大钊同志和其他共产主义者的影响，北京多数的会员都主张“学会有采用一种主义之必要，而且不可不为社会主义^⑧”。代表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等同志在南京大会上也坚持和宣传了这种主张。

由于大钊同志最早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他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卓越领导作用，他在青年中有着崇高的威望。大钊同志在与青年接触中，开始了共产主义的组织活动。当时的北大青年学生朱务善曾回忆说：“我认识守常同志是在1920年春天……我受了当时‘新思潮’的影响，一次到图书馆去找守常同志谈话，请他介绍几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我的请求……同我谈了不少学术与思想方面的问题。谈完话，他从桌旁一个堆满书刊的书架上，拿出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给我，要我看完提出意见，又给我几本河上肇著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一

本英译的列宁写的小册子。他送我出图书馆时还说：‘这本英译的小册子你看完后交还给我，不要转借他人’。因为那时谁保存列宁的著作，谁就有布尔什维克的嫌疑。第一次和守常同志见面，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确是热爱青年，特别是热爱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同那时北大的一些所谓名流学者相较，截然不同^⑧”。

大钊同志团结一批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其中绝大多数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知识分子，1920年8月，终于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当时他们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大钊同志从北大图书馆借来一批外文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组织会员帮助大家学习，以解决书籍方面的困难。以后在大钊同志帮助下，大家逐渐搜集一批马克思主义书籍，又筹集资金购买书籍，设立了一个附属“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小型图书馆，取名为“亢慕义斋”（即英文Communism——共产主义的音译），这是我国第一个存有比较丰富的马列主义书籍的图书馆^⑨。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还保存着一些盖有“亢慕义斋”图章的书籍。在大钊同志的领导下，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要求进一步组织起来开展革命斗争，这就为后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作了准备。

1920年7月起，大钊同志在北大担任教授，仍兼图书馆主任，先在史学系和经济系分别开设“史学思想史”、“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到了10月，又开设了“唯物

史观研究”课，他从不放松任何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机会，学生对他讲课极为敬重，特别是“唯物史观”等课，对青年起了重大的影响。

1922年春，大钊同志辞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职务，改任校长室秘书。1924年底，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由大钊同志负总责。为了党的工作需要，他辞去了几个大学的教授职位，直接领导整个北方广大地区的革命斗争。他坚持战斗在反革命势力包围中的北京，从事极艰苦困难的工作，高举反帝反军阀的红旗，亲自领导了多次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大钊同志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他在北大图书馆的革命活动，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谦虚质朴的高尚品德，对青年同学的诚挚帮助，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永远是共产党人和革命知识分子学习的光辉榜样。

大钊同志永垂不朽！

① 见《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0月14日。

② 见《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7月28日。

③ 见《西行漫记》。

④ 见《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2月21日；1919年1月21日。

⑤ 见高一涵同志回忆，载《五四运动回忆录》第340页。

⑥ 见《少年中国》月刊二卷三期。

⑦ 见《少年中国》三卷一期。

⑧ 见朱务善：《回忆守常同志》，载《五四运动回忆录》第343页。

⑨ 见《李大钊传》第85页。